

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大连市作为甲午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有许多历史遗迹,是爱国主义的直观生动教材。大连市已决定在旅顺、金州、庄河等地建立一批甲午战争遗迹纪念碑,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旅顺人民决定重修“万忠墓”,纪念在日军旅顺口大屠杀中殉难的同胞。

(作者单位:东北民族学院)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威海

玉明 沫兰

由中国史学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共威海市委和市政府联合举办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9月7日至11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与会学者120余人,其中来自我国台湾、香港和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40余人,共提交论文近百篇。会议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为中心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现将与会学者研讨情况综述如下。

一、甲午战争起因

学者们指出,甲午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是日本侵华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台湾学者林子侯从“甲午战争前之日本内政与备战”的角度,论述说:日本明治政府早从军权、政权、财权、教育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政治制度(绝对主义天皇制)、经济、财力、军事装

之顾问,以后又任伪满洲国顾问。战后为苏联战俘,1955年病死于中国抚顺战俘营。

上述几位“南京大屠杀”著名凶手皆系陆大毕业,并曾出国服务,有丰富之知识,而身为军人,对处理战俘问题早已熟悉,心中有所准备。他们不但在书本上要讨论对战俘处理的理论、国际公法、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其对俘虏的观念(松井在狱中曾说“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指日俄战争〕全然不同了)等课题,他们也教育学生和部下如何善待俘虏。举其一例,泽田正久曾在南京反对屠杀7200名中国俘虏,但结果无效。后他写了感想:“我于快毕业陆军士官学校的1937年6月,在市谷大礼堂听过饭沼守学生队长的纪念演讲‘关于俘虏的处置’,他教我们应该好好对待俘虏。这个学生队长现在是上海派遣军的参谋长。毕业后仅仅五个月的今日,他却说:‘应该立刻予以枪决。’‘这是谁决定和下达的命令?’

其实,决定和下达命令的人,他们都亲身体验过如何对待俘虏和无辜百姓。松井及柳川都参加过日俄战争,其他的师团长旅团长以及联队长等多亲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两国时战时停的战争,到“南京大屠杀”已经进行了六年有余,日军已经处理过成千上万的中国俘虏和屠杀很多中国无辜百姓。我们可以断言,所有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高级将领皆为明知故犯,而且多为重犯。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将领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多在中国有过长期的居留,如松井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柳川任北京陆大教官,他们多半是“中国通”,同中国人有过密切的往来,可是在“南京大屠杀”中,他们未曾表现有丝毫恻隐之心。

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常有一个错误观念,即日军攻陷南京后才发生任意屠杀俘虏和平民。本文一开始即叙述日军自上海和杭州湾都是一路杀向南京的。田伯烈不是估计过吗?在南京沦陷前日军在上海和到南京的路上已经屠杀我无辜男女老少三十万人。同时,我们更不该忘记,在上海我英勇的官兵,以低劣的武器,

一、对几个历史情节的讨论

1、乙未割台

“乙未割台”的性质是日本逼迫中国割让台湾,这十分明显。但目下有的学者提出奇怪论点,把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说成是台湾“被遗弃的历史”。针对这一怪论,戚其章用确凿的史实指出,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便不断有人发出“北割中国东北、南掠中国台湾”和“先取台湾”的叫嚣,直到1874年发兵侵台,说明日本侵占台湾是野心久蓄的。他还针对要列强“援助中国,使台湾免于割让,虽有困难,却非绝对不可行”的说法,用确凿的史料,分析了列强对此问题的态度,指出:英、俄、德、法,态度虽各不同,但基于各自的利益,都对日本割台采取了支持方针。认为列强可能支持中国,“使台湾免于割让”的观点只是主观臆测。事实是,为使台湾免遭割让,中国朝野做了最大努力,想尽了办法。先是开展大量外交活动,争取列强支持中国而抑制日本,甚至不惜提出同英国订立同盟,以极大力价换取英国支持。但这些活动没有成功。后又提出抵押台湾的方案,以短时抵押换取台湾的永久主权。最后,在多方争取外援失败之后,台湾绅民才被迫采取自主保台的应急措施,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于危难之际成立,它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对维系人心,稳定局势,组织抗日活动等都起了极大作用,同时也播下了全岛反抗的火种。总之,台湾民主国是反对日本占领的产物,在中国近代统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发生过巨大影响,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那些企图否定其意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日军旅顺大屠杀

日本学者大谷正认为,日军旅顺大屠杀是甲午战争前后,促使国际社会对日本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他指出:旅顺大屠杀事件是实实在在的,当时日本报刊都作了大量报道。这一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欧美各国“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对日本文明国的怀疑”。战争前,国际社会亲日论调占主流,战后日本的胜利反而引起了欧美各国对日本的戒心。虽然其中原因不仅仅是旅顺大屠杀事件,但旅顺

屠杀事件确是列强对日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

3、三国干涉还辽

德国学者李玛柯认为,德国的哥茨施密德,为逼迫日本还辽,违反国内严格指示,曾以战争相威胁,在三国干涉还辽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有关人物的评价

这次会议对甲午战争有关人物多所讨论,较为集中的是对李鸿章和方伯谦等人物的评价。

1、李鸿章。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关键人物,过去论者多以“汉奸”、“卖国贼”论之,目为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近些年论者稍有改变。这次会上,论者以新的材料,提出了新的看法。

刘学照通过对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三次会晤的谈话内容分析认为:“不必因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就说他卖国。‘外交’是‘内治’的继续,没有成功的内治,不会有成功的外交。从李鸿章和伊藤的历次会晤看,中日外交上的失步与得步,是与两国近代化的成效状况密切攸关的。”

美国学者郑哲希认为:甲午败辱,马关签约,割地赔款……世人往往认为李鸿章辱国丧师,然而史料并不赞同。其实当时李氏电稿、奏稿和军机处总署谕旨函稿都证实:李虽主军事缓进,但并未屈膝乞和。甲午惨败实为“体制”所误。清廷臆测西人之长,不过船坚炮利,是以“体用”运动并不注意欧美制度。较之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溃败实有原委。甲午之际李驻天津,一切受命北京军机处,军机处下,机构层叠;军机处内,奕訢督办,心灰体弱,忿恨宫廷,再加上满汉官员不洽,视汉族枢臣或是奸狡误国,或是年老才短。李鸿章夹在其中,怎好施展?过去所云:李氏办洋务30年耗尽民膏民脂,一旦交战,望风崩坍。对这些说法,必须重新考察情况研究。

翁飞根据新发现的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函稿中《李傅相手谕旅顺诸将书》认为,李鸿章并非没有死守旅顺的决心和准备,且在兵力部署和策划救援行动方面尽了主观最大努力。在守旅“有

将无帅”，“宁失湾、断不失旅”方针下金旅惨败等问题上，不应由李负主要责任。

2、方伯谦。方伯谦问题是长久争论不休，也是这次会上争议最多的问题。争议的关键是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是否“首先退避”。

方伯谦的孙女（美籍）方俪祥通过分析中日双方的多种资料，考察两次海战的详细过程，证实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用诈敌战术，击退敌舰吉野；在黄海海战中，据日方记载的时间排列顺序证明，双方主力舰战到下午4点结束，济远则一直战至下午5点半，比其他兵舰多战斗两小时，根本没有逃跑。只因孤舰抵抗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四舰，伤重而不能与主力会合，先回旅顺。李鸿章、丁汝昌谎报军情，诬杀方伯谦后，日舰司令伊东祐亨曾问：“牙山之役，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方女士认为，方伯谦在两次海战中“不仅无过，反而有功”，杀之冤枉。

会上许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孙克复认为，当前否定方氏先逃的，多以新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为据。《杂记》记载，黄海海战中首先逃走的是广甲而非济远。但所述前后矛盾，难以服人。最近又有人提出“西战场”说，认为“经远”于4点半沉没后，济远孤舰一直在西战场与日本第一游击队四舰战到5点半。但此说没有史料依据，纯属于虚臆说。孙氏认为，方氏“临阵擅离部位”违犯战场纪律，应受军纪处分，但罪不至死，杀头量刑太重。

3、其他人物。邢丽雅的《试论甲午战争中的李秉衡》、刘晓焕的《论宋庆》、田锡富的《论甲午战争中的张之洞》、商鸣臣的《刘坤一与甲午战争》、陈铮的《甲午战争与文廷式》等或以新材料，或以新观点，对所论人物进行了评价。

罗运治对徐骧事迹的考证，利用大量地方资料通过对其先祖家族之渡台、创业、繁衍而望重于地方的历史论述，阐明了徐骧乙未组织义军的社会基础；并通过对其事业、性格的论述，阐明了徐骧抗敌爱国的思想基础和民族气节渊源。

汉纳根是德国退伍军官，11次应邀来华，曾任李鸿章副官，参

与旅大、威海等处炮台设计、修建事宜；丰岛海战时曾搭高升号，船沉得救后被奏准任北洋舰队总教习兼副提督，协助丁汝昌指挥黄海海战。战后他曾向翁同和、李鸿章等提出《整顿水师刍言》和统一海军指挥等八条意见（新发现材料），受到清政府重视，委以重任。平壤战后，他又向清廷提出仿照德国编练新式陆军 10 万人的《练兵节略》，详陈练兵计划，促成天津小站练兵之事。谢俊美经过研究认为，汉纳根在华贡献，应予肯定。

三、关于甲午战争中中国军民的民族精神

学者们指出：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这是国耻。但也应看到，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官兵作战是英勇不怕牺牲的。台湾官兵保台抗日的斗争更英勇不屈，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

刘玉明把甲午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归结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献身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誓死不屈精神”和“自强、自信、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等，他指出，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的价值是“常恒”的。

吕实强指出：台湾人民抱着“与其先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态度，其誓死保卫台湾的英勇事迹，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坚强、炽盛、光照千秋的民族精神”。

三、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原因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是中国较日本落后了。这方面过去论述较多。这次会上不少学者深入到文化的、观念的、教育的层面，进行了探讨。

郭墨兰指出：中国没有抓住战前 30 年国际环境相对缓和所提供的振兴发展实现近代化的良机，进行开放改革，致使中国较日本近代化步伐慢了一步。中国落后了，失败是必然的。迟云飞进一步指出：日本通过倒幕维新实现了近代性的民族统一，政权稳固，相

比之下,清政府则常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中央衰落,权力下移,没有能力调动人力物力支持战争,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更多的学者则从军事的角度分析了甲午战败原因。王家俭分析了中国海防政策的弊病。他说: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历代国防政策大多重陆轻海,塞防重于海防。中国又是农业立国,缺乏近代工业基础,也造成海洋意识缺乏,再加上五百年来的“海禁”政策,使许多中国人视海洋为畏途。这就给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带来了经费、技术设备和观念意识上的重重困难,一时难以扭转。中国近代海军开创时未能中央化,任沿海督抚去办,造成此疆彼界,互相掣肘。再加上任人不当,李鸿章、丁汝昌皆非海军出身,完全外行,也是海战失败伏因。史滇生从海军近代化进程缓慢,程度不高,没有建立起近代化军事体制方面论述了海战失败原因;皮明勇则从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战役、作战理论方面的缺陷进行分析;苏读史、张炜等则分别从晚清海防方略和海防战略思想上的失误作了具体论述。

张一文详尽分析了清军甲午战败的军事原因,指出:清朝国防发展战略失误,致落后于日本;对日本扩张野心和实力估计不足,未作军事准备;战略计划不善,海陆军不能协同,要冲旅顺、威海防御薄弱;海军“避战保船”,不敢主动出击,坐以待毙;军队素质差,包括高级将领,皆缺乏近代化培训,不能指挥大兵团作战;国防体制陈旧,没有建立参谋机构和统一的后勤供应。

此外,王守中从教育角度指出,过时的科举制,八股取士是中国衰弱战败的根源之一。王楚良、施渡桥则从清政府的战备指导思想失误角度,追根于政治守旧、“中体西用”方针,使战备未向军制改革发展。王晓秋从中国当权者对日本认识的无知和偏见方面,张红军从勇营制度的军事体制落后方面,李文海从灾荒影响方面,吴福环从“宗藩”思想影响方面,台湾学者张玉法从山东在甲午战争中的防御系统方面等等,皆对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原因进行了论述。

另有一些作者则从民族自省的角度对甲午战争失败进行了反

思,加拿大学者陈志让指出,“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衰微,不止源于政治经济,也不止源于制度政策的失误,也源于人民自己的失误。”美国学者朱昌岐指出:认为中国本该获胜,如不是由于“人事和制度方面的失误,战争的结果可能会对中国有利”的观点,是“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说明问题”的观点。而现在则是到了“抛弃感情用事的做法,尽可能客观地看待这场战争的时候了”,“应该更多地,系统地寻找原因”。

四、甲午战争的影响

学者们论及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近代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1. 政治思想方面

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人受影响最深的是知识分子阶层。日本学者陈福坡指出:甲午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中国感到莫大的耻辱,许多知识分子反应强烈,纷纷要求改革,造成了以后中国的政治改革运动”。金冲及指出:甲午战争的结局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民从日本崛起的事实中更强烈地感到必须“因变致强”。甲午战后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思想变动是以往几十年难以比拟的,如民族主义的崛起,民主精神的高涨,革命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等。屈辱迫人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人猛醒,发愤图强。

与会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人物的思想变化进行了论述。如梁义群从“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涂鸣皋从“维新运动”、黄顺力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俞辛焞、段云章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尚明轩从“廖仲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宋士堂从“孙中山宋庆龄革命思想的发展”、吴乃华从“康有为民主观的转变”、熊宗仁从“贵州知识阶层的觉醒”等角度,具体地分析了甲午战争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和政治改革运动的积极影响。

茅家琦认为：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固然是一场空前的民族大灾难，但客观上却又是以中国全方位的近代化为补偿的，它大大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2. 经济方面

学者们指出：甲午战争后对日巨额赔款造成清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给全国经济造成了破坏；列强瓜分中国，攫夺利权，给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带来不利。

台湾学者李恩涵指出：甲午战后，欧美列强从争夺对清廷政权的控制到对工商业的控制，从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以至争夺铁路、矿山、金融、海关和航务，绝非单纯经济性投资，这些对中国固有主权、行政权和中国自办企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都发生非常不利的作用。

黄逸平认为，甲午战后，外国资本对华输出，加深了中国民族危机和中国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化，但是，它又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近代化。外国投资在华兴办了近代企业，扩大了市场和商品交换，也诱发中国人掀起了振兴民族实业的高潮。朱英则对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作论述说：甲午战败的刺激，使许多政府官员提出发展工商实业以自强的主张，民间“设厂自救”的舆论也日益高涨。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开始推行保护私营商人利益、发展商办企业以振兴实业的新经济政策，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此外，汤可可从清末财政和币制改革，沈雨梧从战后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徐凯希从湖北近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日本学者中村哲夫运用地方志资料，分析华北农村在甲午战后农村集市向城市化转变的一些表现情况，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深入论述。

3. 军事方面

史滇生从甲午战争和中国海军近代化的角度指出：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是因为前期海军近代化进程缓慢，重武器装备而轻体制改革。战后，清政府接受了教训，海军在恢复重建

的基础上,着重进行军制革新,实是一大进步。

刘子明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甲午战后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形成时期。其表现为:按西方模式对军制、装备、训练、战法、管理进行全面改革,完成了新建陆军的近代化;兴办军事学堂,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养近代战争人才,成绩突出;编译近代兵书,发展军事理论,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为创立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新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中国军事思想体系由封建思想向资产阶级思想的转变。

此外,郭剑林、林庆元分别从袁世凯小站练兵,汉纳根和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张之洞编练“自强军”等具体问题,论述了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军制改革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林庆元认为,对这种改革不能估计太高,因为这些新军仍为一些旧式人物掌握,实是“新瓶装陈酒”,最终成为封建野心家争权夺利,军阀割据的个人工具。这是中国近代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兵制改革也是这样。

二、甲午战争对远东和国际局势的影响

1. 甲午战争对世界特别是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和演变的影响是深远的。戴逸、杨东梁分析了近代东亚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指出:19世纪40年代东亚开始了战争的世纪,结束了以往中西文化、商贸和平交往的关系。而甲午战争是引起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关键。甲午战争以前,在远东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中、日、俄、英四国。而甲午战争的结局,导致了这四国力量的彼此消长、分化组合。其后的半个世纪里,远东地区发生了三次大的战争,几乎都是围绕中、日两国展开的。

2. 甲午战后中日关系问题。甲午战后的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是日本侵华,战争不断的半个世纪。针对1898年至1907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这个怪论(认为晚清实行“新政”,不仅全面取法日本,而且得到日本朝野支持与帮助,甚至日俄战争中,日本也没有侵华意图),李侃以大量史实论述了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50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不断,步步进逼,不断扩大升级。

如 1898 年把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1900 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1905 年日俄战争与俄国争夺我东北，之后强租旅顺，在大连设立关东都督府等等，都是一个接一个的侵华事实。“晚清新政”是效法了日本，但并没有换来中日关系“黄金十年”。

3. 甲午战争对日本影响巨大。周启乾指出，日本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实现了由被压迫民族向压迫民族的转变，社会情况发生巨大变化，诸如“企业热”的出现，加速扩军备战，靠掠自中国的 3.64 亿日元赔款支撑而推行“战后财政十年计划”等，使其战后十年的发展超过战前 27 年。日本的战争胜利，尤其是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与有关国家的矛盾。甲午战后日本国内也发生了许多问题。日本学者伊原泽周根据翔实的材料研究了日本对甲午赔款的使用，他指出：明治政府对这笔巨款的使用是周密而有计划的，分别用于陆海军备的扩张，币制的改革，和三基金的设立（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灾害准备基金，教育基金）。赔款使用的结果：①使国力军力极大加强为后来战胜沙俄打下基础，②金本位制的确立，使日本名符其实地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营垒，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

4. 甲午战争对朝鲜的影响。学者们对中朝藩属关系与甲午战争的关系作了探讨。韩国学者金在善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核心是征服中国。朝鲜乃为日本通向中国的桥梁，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朝鲜。朝鲜乃中国“藩属国”，因此，日本不能不首先打破这种宗藩关系。日本对朝鲜诱之以“完全独立”。但是，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完全是一场破人国家，明火执杖的侵略战争。韩国很快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还指出，这场战争影响所及，就世界范围而言，是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料地，划分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三个中心地区（非洲、近东及中东、远东）展开了斗争。甲午战争在远东重要一环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使瓜分世界狂潮进一步高涨。中国首当其冲，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要求在华利益均沾，致使中华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作者单位:玉明,威海市教师进修学校;
沫兰,东岳论丛编辑部)